



朱锋 主编

辩论的实战技巧



北京大学出版社



辩论的实战技巧

朱 峰

张 菁 秦力洪

吴敬铭 叶海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辩论的实战技巧/朱峰主编；张菁等撰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

ISBN 7-301-02947-0

I. 辩… II. ①朱… ②张… III. 辩论—语言艺术
IV. H019

书 名：辩论的实战技巧

著作责任者：朱峰

责任编辑：马辛民

标准书号：ISBN 7-301-02947-0/G·0331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5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3 元

前　　言

辩论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辩论的好坏不仅要求辩论的语言要艺术，同样也必须达到艺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生动、激烈而又富于启发性和观赏性。

不讲究艺术的辩论是吵架，是争吵，争吵长了，完全是一种杂音，既让人头痛，又让人大倒胃口，而辩论即便到白刃战的激荡关头，依然是艺术的争辩，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竞赛，在辩论场上，尽管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看似大家在用语言制造“刀光剑影”，但其语言的魅力所带来的享受，恰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之中，难免观点相左，意见分歧，这时，争执用什么来进行？又怎么让自己说出的话既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又能扬己所长，驳斥对方的论点，同时，又在你来我往的语言交锋中促进沟通，最后使双方的认识又有新的提高，这就需要用到辩论，用到辩论的艺术。事实上，辩论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求职、公关、推销、处理纠纷……乃至大到竞选演说，法庭辩论，小到自由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辩论几乎渗透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在不同的场合，辩论的形式、深度和范围都有所不同罢了。

正是由于辩论有如此重要的生活意义和工作意义，所以古今中外，人们都很注意辩论，热爱艺术的辩论。甚

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号称“辩论牛氓”，年轻时整天蓬首跣足，四处找人辩论。大概亚里士多德辩论辩多了，稍不留神，“辩”成了杰出的思想家。直至今天，人们还能在他的作品中深感“辩”香犹存。

今天，辩论更是渐渐升华的一种智力游戏，成为思想、语言、知识的综合竞赛项目。各种形式的辩论赛不仅是青年活动的内容，而且在大学生中更是深入人心，已成为校园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保留节目。辩论要辩得精彩、辩得热烈，不但要靠语言，更要靠知识和思想；要靠场上的随机应变、灵机一动，更要靠平时的点滴培养和训练。这就不但要能辩，而且也要会辩。在辩论场上，不但要想到辩赢，而且还要想辩得精彩、辩得热烈。不但要自己会辩，而且还要双方辩得起来，真正能够短兵相接，而不是各谈各的，相互观点脱钩太远。

辩论时最忌讳语言乏味、气氛沉闷，也最忌讳思想贫乏，知识面过窄。但又如何才能在辩论中把思想、知识和语言这三者都统一协调起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辩词，这确实是一个技巧和艺术的问题。我们的这本书，就是力求从经验和理论这两个角度，探讨和总结辩论中的一些基本技巧和艺术问题，力求尽量能给读者就有关辩论的问题一个直观、系统的感受，帮助广大爱好辩论的朋友掌握辩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

我本人深感辩论的魅力是巨大的，这种高水平、高技巧的智力游戏不仅能增长我们的语言能力，开拓我们的

视野，增强我们观察、分析、认识问题的思维的力度，更能使我们在双方高品味的文化追求中，促进交流，相互砥砺，以使人们有更好的认识与追求。更何况，辩论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富有趣味的学习过程，为了准备辩论，或使自己对辩题有更多的了解，辩论的准备过程就是一个自觉的学习过程。如果青年朋友都能在辩论中品尝到智慧的快乐和思想的甘美，理性的太阳就在我们不远的上空永远照耀我们前进。

我自己做学生开始就热衷于辩论，历经助辩、主辩，而后到北京大学辩论队教练，以及大小各种场次的辩论赛的评委。目前虽在北大的书山学海中徜徉，却依然痴心不改，依旧在校内外的“辩海”里流连。这本书，可以说是我本人对辩论赛的所有经验、感知与钟爱的总结。

参与本书撰稿的张菁、秦力洪、吴敬铭、叶海林等同志在北大也都十分热衷于辩论，曾代表国际政治系荣获首届“北大杯”百场辩论赛冠军，他们从自己对辩论的真实感受出发所撰写的本书的有关章节，我深信是会给读者以真实启发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朱 锋

1994年5月20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辩论的历史渊源	(1)
第一节 辩论的起源	(1)
第二节 孟辩、墨辩、庄辩、晏辩和范缜之辩	(11)
第三节 古希腊、罗马的辩术	(20)
第四节 政治家们的辩术	(25)
第五节 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的“论辩”	(33)
第二章 辩论的艺术	(42)
第一节 辩论的本质	(42)
第二节 辩论的艺术与技巧	(46)
第三章 一般辩论技巧	(77)
第一节 寻找感觉	(77)
第二节 技巧综述	(93)
①指桑骂槐	(93)
②釜底抽薪	(96)
③以逸待劳	(101)
④偷梁换柱	(105)
⑤借刀杀人	(112)
⑥欲擒故纵	(116)
第三节 组队配合	(120)
第四章 队式辩论技巧（一）	(139)
第一节 析题立论	(139)
第二节 创 意	(155)
第三节 思 辩	(170)

第四节 结 辩	(204)
第五章 阵式辩论技巧（二）	(216)
第一节 反 应	(216)
第二节 出 击	(223)
第三节 转 换	(226)
第四节 猛 打	(232)
第五节 穷 追	(235)
第六节 决 胜	(239)
附录：（一）立论精萃	(244)
（二）幽默语集成	(257)
（三）结辩选辑	(267)
（四）自由辩论精彩对白揽胜	(278)

第一章 辩论的历史渊源

第一节 辩论的起源

应该说，辩论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毕业论文的答辩、学术问题的商榷与争鸣、法庭辩论……乃至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争论，联合国大会各成员国按程序的一般性辩论，各位官方发言人就不同问题答记者问，还有我们所说的以队式为基本组织形式的辩论会。特别是这种有评判、有队员、有正规赛制的辩论会以它本身的吸引力：双方队员唇枪舌剑的精彩表演，赛场的风云变幻、腾挪跌宕、峰回路转深深吸引在座的每位观众和屏幕前广大的电视观众，这也是辩论长盛不衰的“魅力”吧。

人类出现，有了语言，有了见解的不一致，辩论实质上便存在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演讲法则和辩论技巧的书，叫《演讲艺术》，约公元前460年成书，其作者是希腊的著名学者科来克西，他首先提出了“开头”、“主体”“结尾”的三段论，并沿用至今。

我国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尚书·盘庚》就记载，殷商时代，帝王盘庚（相传是商汤的十世孙）曾三次向他的臣民发布命令，实则是对象不同的三次演讲，有根据，有说理，有劝告，有警策，言之有序。事实证明，盘庚迁殷，是平安的，也较为顺利，颇有点中兴的味道，后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这一时代的社会风景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今天，我们仅从演说论辩的角度

去看待盘庚三篇，也是相当有文采的，既有“若网在纲”，“若火之燎于原”，“若射之有志”等比喻，也有“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等引用（古代贤者迟任之语），都是十分精当的。也有一说，认为最早的论辩是《尚书·尧典》。尧帝同放齐、灌兜及四岳辩论用人问题，因为标准不同，发生争论，最后尧帝采纳众人意见，任用鲧治水。我们说，这时的论辩只是发端，真正成就还在以后。

到了春秋战国，群雄并立，战争连绵，烽火不断，外交频繁，功于谋略。《战国策·秦策》有这样的记载：“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也就是说，能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诉诸武力，能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不诉诸战争，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军事斗争中得不到的东西，往往依赖外交斗争来取得，希望在外交论辩中得到补偿。也正是这样的沃土造就了那许多灿若星辰，口若悬河，长于议论的“辩士”。再加上诸侯国君纷纷纳“客卿”于门下，一介布衣往往凭三寸不烂之舌即封侯挂印，“此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战国策》序），怎能不使当时饱学之士趋之若鹜，辩风四起呢？当时的晏婴，子产都是善于辞令之人。古人到底如何看待“辞”的作用呢？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这样解释：“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也正因为言辞这样重要，《论语》上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说法，而归根到底，修辞又为了“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的儒家之道，“修辞立真诚，所以居业也。”儒家是十分重视语言表达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孔子的观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礼记·表记》、《论语·学而》更是表达了孔子提倡“辞达而已矣”，“情欲信，辞欲巧”，反对“巧言令色”，因为“巧言乱德”。这与我们今天提倡写文章要求文笔流畅，感情真挚、措辞合适，反对拍马溜须曲意逢迎是一致的。《论语·宪问》中还有“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更进一步表达了孔子对于

言过其实，光说不做或多说少做行为的不齿。我们在论辩当中，一般是采用普通话，其普通话标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表达效果，因为语言毕竟是交流工具，是媒介，《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指的“雅言”就是标准话，看来古今在语言的标准化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也一样。众所周知，孔子是我国的大教育家，弟子三千，其中宰予、子贡长于辩，也是有史可查的。孔子“四科”即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其“言语”所教授的内容正是学生出使四方时“专对”所用。

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观点，提出：“言近而旨远”，追求意义的深远。《孟子·尽心》中，大家熟悉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意义深远，值得思索玩味的地方。孟子另一特点就是正气凛然，诚如他自己所说：“我言，我善养吾之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他主张儒家一向主张的“仁”政，敢于犯“上”，不阿权贵，批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饥民遍野、饿殍满地的梁惠王的政治统治无异于“率兽而食之”，实“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之正气！

荀况更是论述演讲、论辩的原则、目的、具体方法的一代大家。他提出了著名的“君子必辩”的论断，著《非十二子》与道、法、名、墨各派一争高下，旨在宣传礼义之道，反对其他异说惑众。荀子提倡谈话之术，并主张论辩。他曾将辩论分为三类：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和奸人之辩。并自认为是士君子之辩，推崇“圣人之辩”，反对“奸人之辩”。

荀子在《说难》中还论说了谈说之难，进一步阐明了具体原则、方法：言辞必须“合先王”，“顺礼义”、“口不出恶言”，是主张遵守道德，讲究语言美，而“正其名”、“为其辞”、“推类而悖”、“辩尽其故”，则又是就论辩本身对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

提出的要求。“齐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驩芬苾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说常无不受”。就是说态度要严肃、郑重、真诚，信念坚定，用比喻，比较，热情宣传自己的东西，珍视它，重视它，这样往往被人们接受。荀子还反对“为辩而辩”，认为“以期胜人为意”（《性恶》）实“下勇”也，认为这种辩不是辩，是“争”，是“可鄙之争”。以上的经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指导意义，弥足珍贵。

在中国传统意义的文化中，向来儒道并称，道家以老庄为代表，《老子》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说。老子虽然有这样的学说，这样的言论主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正说明在老子的时代有辩论之风，有辩论之人，而且已引起老子的重视吗？庄子之辩可谓纵横跌宕，变幻莫测，他在《天道》、《知北游》等文中主张自然为文，语言重在意。最富特色的是庄子多用比喻，想象瑰丽奇特，天马行空一样，出人意表，时而如海涛汹涌，时而似行云多变。后文将作详细介绍。

战国时代的著名诡辩家公孙龙与他的“白马非马论”论不能不提及。《公孙龙子》中写道：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亡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如求白马于厩中，亡有，而有骊色之马，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亡则白马竟非马。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

文章以“言白以名色”，“言马以名形”为据，导出“色非形，形非色”，进而说“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否定了形色可以统一的事实，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类似还有“楚人非

人”之类，为后世诡辩者纷纷效法。

战国群雄角逐，游说风行，辩难蜂起。像当时邹忌、陈轸均是史载名辩，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自不必说，孟子早就抱怨：“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再加上诸侯收揽推波助澜，难怪后来《东坡志林·游士失职之祸》有这样的话：“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有此现象，当时蔺相如凭自己的口才和智勇位居廉颇之上也没什么疑问好讲了。

法家代表商鞅，也是一个善说之人。史载，他曾对秦孝公说“称霸之道”，孝公“语数日不厌”；另一代表韩非，自己口吃十分遗憾，但为文不乏论说之道。《说难》论述劝说君王之难，《亡徵》又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

墨家代表墨翟在《小取》中说：“天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将论辩的目的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一时期论述谈说的文章相当多。春秋时的《左传》虽然以记事为主，但也有记言的，如《曹刿论战》等篇；战国时的《战国策》、《国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书中更是有许多这类文章；再有汉人司马迁著的《史记》一书也有不少是记载这一时期的谈说的。

关于辩论的论述，杂家的《吕氏春秋》之中也有零星散记，观点近于庄子之说。

待到秦始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天地自行消亡，英雄无用武之地，且谋官之道也渐由地方官举荐发展到后来隋唐详备的科举考试，更多寒窗苦读的学子以笔代口，文言其声，这当然比先秦诸子因受时代限制，不得不靠广为游说推广扩大自己学说的影响优越得多，也直接了当，方便得多。再者，先秦，纵横捭阖之士可直面君王，有通过对答展示自己辩

才、韬略的机会，而以后各朝代，几多布衣百姓能有幸一睹“天子”？当然也更谈不上对白，及由此的平步青云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诸侯并立，各自都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加强自身，提高国力的问题。强者要兼并弱者，甚而统一天下；弱者要反兼并以求生存。为此诸侯国都希望谋辩之士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处理好各种外交事务，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但并不是说，论辩之士就此消亡，只是与战国明显区别，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阶层相对独立存在。有些谋辩之士在历史上也相当杰出，只是没有留下专门阐发自己政治主张的文字或有关论辩的著作，或者因为有更突出的业绩以及在其它方面的更大的影响掩盖了论辩方面的影响罢了。论辩并没有随“辩士”而消亡。例如，汉代桓宽的《盐铁论》便是不可多得的。再有就是陈胜的那篇相当精彩的短篇演讲，《史记·陈涉世家》记载：

（陈胜）召公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籍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人，且壮士不死即亡，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摆事实，讲道理，一面是死路一条，一面不仅有生的希望而且有前程无量的诱惑，何去何从？何取何舍？不言自喻。

如果说秦是一低潮，从秦以后，辩风也是日下的，或奉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语），或推崇“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傅玄语），但总的的趋势中又有几个小高潮，其中西汉刘向撰《说苑》一书便是明证。《说苑》共二十卷，《善说》一卷专门论演讲与口才，是从春秋到秦汉的一个总结。刘向重视“谈说之术”，他先引了四句经典又举了四个实例，可谓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刘向进一步发展了荀子的观点，将先代已有的理论进一步加工，完善，如果说《说苑》是集大成者，想来是不为过的。

南北朝时期有齐梁间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其立足真理的自信和“不卖论取官”的品格在辩坛也是熠熠生辉，让人叹为观止，

拍案击节，后文详述。

以后历代不乏敢于直谏的名相忠臣，其中也不乏善说善论的善辩之士，但始终没有再出现“百家争鸣”的鼎盛，也没有出现纵横天下，“如丸走板，如水建瓴”舌辩古今的精彩，这固然与时代背景，与政策时令有很大关系，毕竟历史在推演，生产在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

历史的时针拔到近现代，较前代更为突出，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坚定与执着，所谓气贯长虹，其情其义感天地、泣鬼神，以致每每扼腕，不自觉地诵出来，似乎唯有抑扬顿挫之声方不辜负好文章。

鲁迅先生，可谓语言大家，口诛笔伐，其杂文开文坛一代先河，似匕首，似投枪，切中要害，独具特色。例如《“友邦惊诧”论》一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警镇压反侵略的爱国学生，而其理由，是所谓的“友邦人士，莫名其妙，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先生写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毙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党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三个“不惊诧”和一个“惊诧”，没有再多的语言，但其悲愤，其鄙夷正是化在此无声之处。

对于夏明翰，多数朋友都会记得那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文才不错，口才也是相当好，看刑场一节，漫不经心，所答非所问：

——“你姓什么？”

——姓“冬”。

——“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乱讲！”

——“……你们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爱国。我姓夏就当然应该说成‘冬’！”
——“多少岁？”
——“共产党万岁！”
——“籍贯？”
——“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
——“这成什么话！！……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共产党不信神，不信鬼！”
——“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们的人？”
——“知道！”
——“在哪里？”
——“都在我心里！”

这便是他的信念，他的精神，他的气概了。

周总理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具有非凡的口辩才能。是友也好，是敌也罢，或者亦友亦敌，不友不敌，他总能沉着应付，自由周旋，于优雅谦逊间捭阖纵横。这其中有不少是场面十分尴尬，环境十分险恶，一般人们认为问题比较尖锐，十分棘手。看下面几个小例子：建国初期的一次答记者问，有的记者问：“中国的路为什么叫马路？”总理回答：“走马克思主义的路。”有的记者别有用心地欲讥笑新中国的贫穷，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有多少？”一则这是属于国家机密，二则说出来具体数字，也确实是底子较薄，夸大又有不实之嫌，总理采取了迂回战术：“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18元8角8分，面额分别为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金融机构，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它所发行的货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是巧辩、智辩，依靠反应的机敏和语言的巧妙。抗美援朝期间，一次，总理批阅完文件接受一美国记者采访。美国记者看到总理桌上放的是一支美国派

克钢笔，就诘难：“你们堂堂中国人为什么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总理含蓄地答道：“提起这支笔呀，那可说来话长了。这不是支普通的笔，是一个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觉得有意义，就收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这是机变，是暗示，总理由他的派克钢笔而至“朝鲜朋友抗美的战利品”，而至“留作纪念”，化险为夷。……

但他却做过一件自己十分惋惜的事，他曾望着一架飞入云霄的飞机，一再重复：晚了，晚了。专机上坐着二位要人：蒋介石和张学良。张学良将军亲自护驾，以压“西安事变”之惊，但并未料到以后的几多变故。每念及此人们常不经意叹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何必放虎归山？当时张杨二位将军手下的军官们就是这样围住了中共派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先声夺人：“杀蒋介石还不容易吗？”语惊四座，更多的人感到的是意外。“可是，杀了他以后怎么办呢？局势会怎么样？各位想过吗？这次抓了蒋介石不同于十月革命逮捕了克伦斯基，不同于滑铁卢擒获了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后果，后者是拿破仑军事失败的悲剧。现在呢？虽然捉了蒋介石，可是并没有消灭他的实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加上英美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逼蒋抗日是可能的。我们要爱国，就是要从国家的，民族的利益考虑，不计较个人的私仇。”先是意料之外，五个连续的发问，入情入理，晓以大义，又重归于意料之中。朋友，我们从中是否可以感到，为了政治的需要，语言艺术可以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在外交场合，在对敌斗争的场合，机辩、智辩、巧辩，灵活得体地鲜明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并附以应有的气势、力度，使论辩成为“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再现，而不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厉。

现在的论辩场，正反双方的辩论队员往往儒风雅气，文质彬彬谦谦君子，少有吹胡子瞪眼，声嘶力竭者，偶有个别，顿时觉